

湖南省湘学研究院系列成果

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湘学名人丛书

主 编：刘建武 执行主编：刘云波

推进中国 思想现代化进程的 十大湘学名人

刘云波◎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湖南省湘学研究院系列成果

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湘学名人丛书

主 编：刘建武 执行主编：刘云波 副主编：郭钦

推进中国 思想现代化进程的 十大湘学名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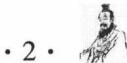
刘云波◎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总序

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以自己的勤劳、勇敢和智慧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为人类社会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但18世纪中叶以后，古老的中国却在世界工业革命的浪潮中落伍了。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破了清朝政府“天朝上国”的迷梦，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进入了百年苦难时期。也正是从那时起，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无数志士仁人矢志不渝的梦想。

“一本湘人奋斗篇，半部中国近代史。”在百年艰难曲折的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湖南人做出了突出贡献。在近代史上，涌现了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黄兴、宋教仁、蔡锷等杰出人物，开启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思想闸门和实践进程；近现代以来，又涌现了一大批经济文化和科学教育等领域的杰出人物，比如，民族矿业先驱梁焕奎、民族化学工业之父范旭东、“盐碱大王”李烛尘等实业家，著名工程师宾步程、军工大师李待琛、医学微生物学家汤飞凡等科学家，画家齐白石、历史学家翦伯赞、剧作家田汉等文化大师；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涌现了以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蔡和森、彭德怀、贺龙、罗荣桓等为代表的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开辟了中国历史新纪元。这些湘籍杰出人物，都是源远流长的湖湘文化孕育出来的湘学名人，他们以其文韬武略，叱咤风云，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



生了巨大推动作用。

如此众多的政治、军事、思想和文化名人，在百余年内高度集中地出自湖湘大地，其勋名之著、业绩之丰、人数之众，全国无出其右，这绝非偶然。可以说，正是湘学所倡导的心忧天下的爱国情怀、敢为人先的进取精神、经世致用的务实学风、兼容并蓄的开放胸襟，激励着湖湘人士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惟楚有才，于斯为盛”，这既是时代大潮呼唤催生的产物，更是千年湘学氤氲荏苒的结果。

为了深入研究和生动揭示中国现代化进程，进一步激发和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湖南省湘学研究院组织专家学者，推出了这套《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湘学名人》丛书。丛书包括思想卷、政治卷、军事卷、经济卷、科技卷五卷，集中展现了我国现代化早期 50 位湘学名人在思想、政治、军事、经济、科技等方面成就，生动诠释了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深刻揭示了湖南在中国近现代独领风骚的历史之谜，为我们传承和弘扬湖湘文化优良传统，增强三湘儿女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推动湖南改革发展，提供了难得而宝贵的精神养料。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要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湘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加强湘学研究，努力把湘学研究院打造成为有影响的“湘”字号文化品牌，对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湖湘文化的创新和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丛书的出版，是我省湘学研究的又一有价值的成果，必将有力地推动湘学研究和宣传的进一步深入，引导人们不断弘扬湖湘文化优良传统，为加快富民强省凝聚起更大更强的正能量。

当前，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正激励着全体中华儿女为之不懈奋斗。7200 万三湘儿女理当传承湘学名人优秀品质，发扬光大湘学优良传统，自觉担当共筑中国梦的时代责

任，为加快我省改革发展，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的新贡献。

是为序。

许又声

2014年6月

(作者系中共湖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湖南省湘学研究院名誉院长，湖南省湘学研究指导委员会主任)

前　言

作为《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十大湘学名人》中的一卷，本书主要选取了晚清以来在思想解放方面影响较大，直接或间接推进了中国思想现代化进程的十位湘学名人。

众所周知，清代中期以前湖南在全国的影响和地位是“碌碌无所轻重”的，直到清代中期以后，湖南和湖南人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才逐渐显现。特别是曾国藩、左宗棠领衔的湘军兴起之后，整个近百年历史上，湖南人在全国可谓异军突起、大放光彩。他们领导或参与了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每一次重大运动，他们的影响也不仅仅局限在政治、军事方面，其他方面同样是不甘人后，特别是在思想观念方面，秉承了湘学“经世致用”历史传统的湖南人紧扣时代主题、紧跟时代潮流，提出和阐发了一系列先进的思想主张，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中国思想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本书名为《推进中国思想现代化进程的湘学名人》，那么“推进思想现代化进程”无疑是本书选择人物的唯一标准。换言之，在思想界有大影响并不见得就能入选本书，因为有些人思想保守，影响也可能很大，但它对现代化进程不能起到推进作用，反而只能起到阻碍作用，自然就不能入选。所以本书所选人物必须契合“推进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这一主题。“现代化”这一概念在学术界有着不同的阐释，但就中国近现代社会而言，现代化的主题应该是国家富强和民族独立。任何历史人物的言行，只要是契合这两大主题，并对近代中国实现这两大历史任务做出了重要贡献的，我们就可以认为它推进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就思想现代化而言，他（她）的言论、



思想应该体现出对国家富强和民族独立的强烈追求，提出了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独立的可行方法和途径，并对时人和后人产生过深远影响。这是我们在挑选相关人物时的主要或者说唯一标准。如魏源，在嘉道之际内忧外患的危机背景下，他提出了符合时代主题和发展趋势的改革思想，尤其是面对西方强敌的侵略，他破天荒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主张，打破了当时中国人对于西方的蒙昧无知，直接推进了中国思想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化；如唐鉴，他虽然是一位典型的传统学者，但他顺应时代潮流，提出了理学经世的重要思想，对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化转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如郭嵩焘，作为晚清中国出使西方的第一人，他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气，积极鼓吹西学和洋务，并且提出了“学习西方，必辨本末”的进步观念，开阔了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推动了中国近代思想由“洋务”到“维新”的重要转变；如皮锡瑞，作为晚清著名的经学大师，他以今文经学为指导探索变法理论，为维新变法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使得维新变法思想主张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资源相融合，更加普遍地为中国社会所接受；如陈天华，他的著作《猛回头》、《警世钟》等文字通俗易懂、文锋犀利且朗朗上口，在传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近代民主革命进程；如杨毓麟，他的民族主义与民主革命思想契合了中国社会变革的要求，拓深了国人对社会现实和国家前途命运的认识，有效传播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进行了有力的革命思想动员；如杨昌济，其所提出的有关伦理思想吸取了中西之精华、顺应了时代之潮流，在强化国人的民族意识、国家观念，培育国人的爱国情感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如易白沙，作为新文化运动中反对尊孔读经的第一人，他对历代帝王荒淫腐朽、残暴不仁的罪恶行径进行了集中揭露和批判，为反袁斗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引领了当时反对封建专制、追求民主自由的时代潮流；如蔡和森，作为中国早期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党的理论家、宣传家，他主动接受和信仰马克思主义，并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之中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称得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人，并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如李达，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和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出版了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卓有成效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新中国成立后更致力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和宣传，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重大贡献。

必须说明，晚清以来在推进中国思想现代化进程方面有影响的湘学名人远不止 10 个，本书仅仅遴选出以上 10 人，绝不能说只有这 10 人对推进中国思想现代化进程做出过贡献，其他还有许多名人没能入选本书，大致不外乎以下两点原因：

第一，相较于我们选取的以上 10 人而言，他们在推进思想现代化进程方面的影响和地位可能要稍逊一筹，所以只能排除在 10 人之外。这当然是篇幅所限的结果。

第二，更需要强调的是，还有一些湘学方面的杰出人物，他们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各个领域都有着重大影响和很高地位，入选任何一卷都有据可依。所以我们在遴选时只能看他发生影响领域的侧重点。比如曾国藩、毛泽东等少数几位湘学翘楚，他们在推动中国思想现代化进程方面也有不逊于以上十位的地位，但综合比较来看，曾国藩和毛泽东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影响可能更大，放在政治卷或军事卷可能更为合适，所以在思想卷只能忍痛割爱予以舍弃了。

当然，无论以上哪种理由，这都仅仅是我们编撰者的一家之见，一定会有许多不准、不周之处，还请广大专家、读者批评指正。

本卷具体分工如下：主编和统筹为刘云波。《唐鉴》、《李达》、《易白沙》、《杨昌济》、《杨毓麟》由郭辉撰写，《郭嵩焘》、《陈天华》、《皮锡瑞》、《蔡和森》由邵华撰写，《魏源》由李鹏撰写。

目 录

前 言 (1)

唐鉴 近代中国义理学派巨擘之一

- 一 生活环境与道统论思想 (3)
- 二 理学家的教育思想与教学实践 (10)
- 三 经世思想与晚清理学的复兴 (15)

魏源 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先行者

- 一 敦厚家风与勤学不倦的少年时代 (21)
- 二 游学天下与思想的转寰 (26)
- 三 经学研究与《皇朝经世文编》的编撰 (29)
- 四 爱国思想的表达与放眼世界 (33)

郭嵩焘 近代中国出使西方第一人

- 一 家世与青少年时代 (43)
- 二 科举仕途，馆幕生涯，思想初变 (46)
- 三 “通知洋务第一人” (49)
- 四 出使西方第一人 (54)
- 五 积极推动湖南的现代化 (61)



皮锡瑞 近代中国通经致用的变法经师

- 一 家世与早年生活 (67)
- 二 甲午前后思想的转变 (70)
- 三 主讲南学会，开通近代湖南变法风气 (73)
- 四 融通古今，以经学为变法旗帜 (81)
- 五 尽瘁桑梓、推动近代湖南教育现代化 (84)

陈天华 近代中国革命党之最强音

- 一 青少年时期 (91)
- 二 游学日本、投身革命 (94)
- 三 近代中国最美丽的民主共和国之梦 (98)
- 四 革命党之最强音 (103)
- 五 难酬蹈海亦英雄 (106)

杨毓麟 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杰出思想家

- 一 少年经历与早年倡导维新思想 (115)
- 二 民主革命思想的成型 (119)
- 三 日本留学期间的革命活动 (123)
- 四 《神州日报》与民族主义思想的宣传 (126)
- 五 欧洲游学期间革命思想的继续发展 (130)

杨昌济 近代中国著名的伦理学家与教育家

- 一 家世与赴日本留学 (137)
- 二 教育经世思想与湖南早期共产党人群体的形成 (138)
- 三 伦理思想的历史价值 (142)
- 四 体育思想的形成、实践与人才的培养 (150)

易白沙 新文化运动中反对尊孔读经第一人

- 一 家世与早期革命活动 (159)

二	流亡日本与民主思想的发展	(160)
三	无鬼论的哲学思想	(164)
四	《孔子平议》的思想内涵	(169)
五	《帝王春秋》对封建专制的批判	(172)

蔡和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行者

一	早年时期的艰辛探索	(181)
二	“极端的马克思派”	(184)
三	党内杰出的理论家和宣传家	(189)
四	大革命时期的蔡和森：总结党史第一人	(193)
五	精诚贯日月，烈士万千年	(197)

李达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

一	早年求学与对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接受	(203)
二	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坚定	(206)
三	共产党“一大”的组织者和筹备者	(210)
四	马克思主义研究成就卓越	(214)
五	马克思主义教学的实践	(218)

参考文献 (224)

唐鉴 近代中国义理学派 巨擘之一

作为近代中国义理学派的代表人物，唐鉴服膺程朱理学，主张“重宋学而轻汉学”、“重义理而轻文章”、“重视经济之学并倡导守道救时”。希望借助程朱理学来拯救时弊，能够对国家社会有所裨益。唐鉴及其学术思想对咸同年间理学的复兴及晚清经世学风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咸同以后中国思想的走向，可视为影响中国思想现代化进程的湘学人物之一。



唐鉴是近代中国义理学派的巨擘之一。他的理学思想、经世思想、教育思想，对近代中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的思想直接关联咸同之际的理学复兴，对曾国藩、倭仁等人都有积极的影响。

一 生活环境与道统论思想

唐鉴（1778—1861），字栗生，号镜海，湖南长沙县人。祖籍江西丰城县，明永乐中期迁往善化居住。唐鉴的祖父名唐焕，父亲唐仲冕。他在6岁时即入塾读书，深受老师喜欢。12岁开始读《纲鉴》，并能达到每遇一事便能发一论的境界。16岁时应童子试，屡列前茅。1809年，他32岁，成进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1811年，授职检讨，充当国史馆协修。后历任御史、府、道、臬、藩等官。1840年，被召为太常寺卿。

唐鉴所生活的年代，不管是在政治上还是学术上，都是一个发生急剧变化的时代。清代中后期，隐藏在王朝内部的危机开始逐渐暴露出来。特别是社会经过白莲教起义，以及林清、李文成领导的天理教起义的打击后，清政府开始呈现出种种衰亡迹象，比如说吏治的腐败、道德的沦丧、社会的黑暗，民不聊生。唐鉴长期在地方任职，对清朝种种社会败象观察得尤为深刻。唐鉴作为一个笃信程朱理学的封建官僚，在观察和认识社会危机和败象之后，试图在传统的儒学中去寻找能够拯救时弊的方法和措施。他将这种败象归于人心的浇漓，甚至进一步将之归结到学术的不明，认为社会的败乱正是由于纲常、伦纪、政教等方面受到邪说的影响。其实，唐鉴是试图在文化方面追寻这个社会堕落的原因。

站在一个理学家的角度来说，唐鉴认为学术不明，导致社会败乱不无道理。元明以来，统治者一直将程朱理学视作国家意识形态的工具，而原本具有社会批判精神的程朱理学流于空疏的阐释和无谓的呻吟，学术上的创新几乎丧失，陷入了僵化状态之中。清朝之际，虽然理学依然被认为是国家意识形态，但只能在文化高压政策下，简单重复官僚话语，进行机械的阐释而已。在这种情况下，迫不得已转向文献考据研究，所以才有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宋学”相反方向的“汉学”研究，希望能够从中获得某些



方面的突破和创新。正是在一大批学者的鼓动下，“汉学”逐渐在社会上兴盛，并成为当时的显学。理学在相当一部分人的视野中，只不过被当作考试的工具，只是借此进身仕途，很难再在学术上有所发展。

不过，到了乾隆末期，这种考据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转机，因为当时极盛的清王朝出现了显著的社会危机，一些社会有识之士开始质疑当时的显学，也就是标榜“汉学”的考据之学，开始从新的角度思考儒学传统。在嘉、道之际，由于社会危机的进一步加深，盛极一时的清王朝开始走上衰败的道路，各种社会问题都呈现出来。统治阶级的生活表现得非常奢侈，皇室庆典的耗费巨大。乾隆皇帝为他母亲祝寿所耗费的白银就达到数百万两，他自己生日庆典的耗费更大。除了皇室成员之外，王公贵族、文武百官，甚至一般的地主、商人的生活都非常奢靡。这种奢靡的生活必然导致吏治的腐败。官员以送礼的名义向上司行贿，造成社会的极度腐化。这些社会现象的造成，在唐鉴看来，都是因为纲常伦纪、政教禁令松弛，是异端邪说的鼓动所致。他在太常寺卿的任期内，开始在京师讲学，宣扬道统思想。

太常寺卿虽然名列九卿之首，实际上为闲曹冷职，仅仅是负责坛庙祭祀的相关事宜。唐鉴在太常寺卿的职位上，没有半点怨言和失落，能够细致地从事相关事务，恪于职守。比如，每到冬天的时候，京城坛庙里面已经长得非常大的树木都被砍伐掉，以补种上新的树木，在当时被认为是“去枯补新”。所以，就会有人乘机砍掉树木，对坛庙的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唐鉴为了能够更好地保护坛庙，提出天坛为国家重地，与国家的风水有重要关系，不应该轻易动土，以此来禁止树木的砍伐。并且，唐鉴在公务闲暇之时，都会端坐在陋室之中，面貌庄重恭敬，不管是三伏热天，还是严寒的冬天皆是如此，他想以此端正的形象感怀世人。唐鉴在京师居住于狭窄的辗转胡同内，平时也是以程朱理学作为自己的修身之道。他在世风日下的社会环境中，能够洁身自好，独善其身。他虽然外官经历多年，但依旧两袖清风，过着清贫的日子，这对于一个在官场中浮沉的人

来说确实不容易。唐鉴利用两年时间撰成了《国朝学案小识》，再次从理学的角度，接续了清代儒学的道统，希望借助韩愈以及朱熹所提出的道统论以扩大儒学的旨趣，以求能够弘扬已经处于弱势地位的儒学。在唐鉴的心目中，儒学即程朱理学的不振，实际上也是种种社会危机产生的根源。认为社会的忧患，主要是礼义廉耻的丧失。所以，极力振兴清代儒学道统已刻不容缓。

唐鉴对程朱极力推崇，非常重视。在《朱子学案目录序》中，唐鉴认为孔孟之道的精髓只有朱熹才真正得其要义，“孔子之学之精，非朱子不能及其蕴奥；孔子之德之盛，非朱子不能仰其高深；孔子之道之大，非朱子不能及其分量”^①。唐鉴心中的道统自然就是程朱理学，认为程朱理学是儒学的正统。他评价清代学者中哪些属于儒学道统，哪些不属于儒学道统，就是以是否谨守程朱理学为标准。唐鉴不遗余力地对程朱理学进行赞扬，极力突出和肯定程朱特别是朱熹在儒学道统中的位置和价值，反复论及程朱是孔孟之道的正统。他以此来衡量清代的学者，看他们是否遵循程朱理学，如果遵循的话，就将之列入道统之内，背离程朱理学，就将之排斥在外。

唐鉴推崇程朱，却极力贬低陆王，认为陆王心学是导致明王朝灭亡的罪魁祸首，指出，陆王心学是有心无性，人都不是人，世道所以才乱了。他甚至认为，陆王心学是乱世之学，要想长治久安，一定不能提倡陆王心学，还必须对这些进行严厉的禁止。由此不难看出，唐鉴的基本主张是尊朱贬王。朱熹主要是选择了周、程、张作为道统接受的主要脉络，将汉唐的诸儒排斥在道统之外，而唐鉴的道统论则是从孔孟直接到程朱再到清代诸儒。唐鉴认为儒学之道从孔子传到颜渊、曾子，再传到子思子、孟子。在汉唐的时候，则没有传承儒学道统的圣人。只有宋代，二程和朱熹才接续了一度中断的道统，将儒学发扬光大，缔造出新的思想体系，即程朱理学。这个时候的程朱理学被认为是儒学的正统。所以，清代学者若不尊

^① 《朱子学案目录序》，载唐鉴《唐确慎公集》（卷1），中华书局1924年版，第11页。

崇程朱理学，则不能被列入儒学道统之中。

唐鉴还明确指出，怎样才能够紧随程朱之学而传承儒学道统。朱熹为学有四纲，即“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穷理以致其知，反身以践其实”。唐鉴认为这四者就是“求道”的方法和途径。他认为圣人的学问，在于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离开这四者，则远离了道。这就是唐鉴对“求道”之法的具体解释，即格致诚正、修齐治平，背离这样的途径就是背叛了儒学之道，如果实践的程度不够也就背离了儒学之道。在唐鉴的《国朝学案小识》中，被唐鉴列入儒学道统的共有 67 人，这些人基本上都是以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作为他们治学的根本来追求。当然，每个人的实践程度会存在差别。

唐鉴对清儒学者进行悉心的安排，按照“传道”、“翼道”、“守道”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儒学者的地位呈阶梯状。“传道”者的地位最高，受人尊崇。其次是“翼道”者，然后是“守道”者。在《国朝学案小识》中，这三者的人数是依次递增的，而叙述的详细程度上则依次递减。这样排列清代儒学者是按照他们在遵守、维护程朱理学上的程度，也就是他们的思想与程朱理学的接近程度如何。唐鉴将儒学者进行如此的三分法，在整个儒学的发展中属于独创。

唐鉴认为道的最高代表者是孔孟程朱，所以，所谓的传道之“道”就是指要传授孔孟程朱之道。然而，孔孟程朱之道晦涩深奥，必须加以阐发，这样道才能够更加明晰，才能够流传永久。传承孔孟程朱之道的人就是“传道者”，唐鉴在《学案提要》中对“传道”者进行如此的表述：“传何由得其道乎？曰：孔孟程朱。道何由而传得人乎？曰：述孔孟程朱。述孔孟程朱何由遽谓之传乎？曰：孔孟程朱之道晦，而由斯人以明孔孟程朱之道。废而由斯人以行孔孟程朱之道，何由而遽明遽行乎？曰：辩之严，异说不能乱；行之力，同志服其真。虽未必遽能大明大行，而后之学者可由是进乎明，进乎行也。”^① 唐鉴认为传道的人就是传孔孟程朱之道的人。这些人能够身体力行将“道”传播于世，能够排斥理学之外的其他学说，起

^① 《学案提要》，载唐鉴《唐确慎公集》（卷 1），中华书局 1924 年版，第 17 页。